

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

孙显斌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曾经在世界东方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中包括众多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又因印刷术的发达，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流传至今，其中当然不乏科学技术文献。整理这些科技典籍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世界理解中华科技传统的重要途径。

一、现存数量及整理概况

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摸清了家底，现存 1912 年以前出版的古籍约 20 万种，50 万个版本¹。我们按图索骥，对其中与科技相关的典籍数量做了粗略估算，这些典籍主要分布于如下几个类属：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444 种）、政书类考工之属（81 种）以及水利之属（314 种），子部兵家类（约 230 种）、农家类（467 种）、谱录类花木鸟兽之属（339 种）、医家类（6684 种）、天算类（1656 种）、术数类（约 140 种）、新学类（884 种），合计约 11239 种。西学东渐典籍除此“新学类”，又据《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 1919）》估算，合计 1678 种，其中心理学 25 种，地理 272 种，自然科学 1381 种。当然，“汉译西学”和“新学类”有部分重合，由此估计现今留存古代（pre-modern）科技典籍数量在 1.2 万种以上，约占古籍总量的 6% 左右。

这些传统典籍由于使用文言，基本上没有标点，还常常拥有众多版本，非常不便于阅读和研究，需要进行必要的整理。当然除了点校整理，为保存和传播古籍的原貌而进行的影印和扫描也是一种整理方式。这两种整理方式的传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影印方面如影抄和影刻，点校整理如宋代岳浚（旧题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

* 本文英文版发表在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第 1 卷第 2 期，113—131 页，科学出版社，2017 年。

¹ 在世界历史中，1912 年已经是“现代”了。虽然早在 17 世纪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已经传入，19 世纪下半叶中国更是开始了工业尤其是军工的现代化探索，但兼顾典籍传统与政体的变革，在中国文献学界一般以 1912 年作为“古籍”的划分点。

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¹这里所说的建本、蜀中字本、兴国本等版本，可能就是较早的句读式整理的典籍。从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地“整理国故”便成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一部分，胡适在1919年《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拉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序幕。同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也拉开了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的序幕。现代古籍整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1920年，民国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汪原放在胡适等人的支持下为宣传新式标点，点校、分段并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了《水浒传》，这是第一次使用新式标点整理出版古籍²，时至今日已经将近百年。同年，胡适在讲演中提出整理古书应包括加新式标点、分段、校勘以及作者与书籍内容的简介和评价等³。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依据胡适的理念推出了《学生国学丛书》，于1930年出版点校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可能是最早的新式整理的科技典籍。应该说“整理国故运动”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奠定了中国现代古籍整理的范式。虽然如此，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包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除了影印，多是旧式句读排印本，也较少多个版本的汇校，真正大规模地实践这一新的范式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整理和出版古籍草案》时，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整理时将以最完备的最好的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各种本子，比勘对校，作出校勘记。写出新的序文，对作品加以批评与研究。标点和索引也很必要⁴。一些学者如夏鼐也指出整理古籍第一步是整理出一个精心校勘过的本子，作为定本⁵。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定本式整理”，逐步成为现今通行的古籍整理范式。

据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其后每年保持500种左右⁶，这样计算，新世纪以来整理出版古籍图书也有7000余种。那么，民国以来整理古籍应该超过2万种，约占存世总量的十分之一。据

¹ 胡适等《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载《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4期，143页。

²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285页。

³ 胡适《再论中学国文的教学》，载《胡适文存二集》卷四，1924年，256—258页。

⁴ 许逸民《古籍影印出版的规范问题》，载《古籍整理出版十讲》，2002年，岳麓出版社，262页。

⁵ 夏鼐《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些意见》，载《文献》1982年第4期，25页。

⁶ 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中华书局，2003年，5页。

《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数据截止 2003 年)统计,整理科技典籍 1876 种¹,由于科技典籍每年整理的数量不多,加上近些年新整理的也就在 2000 种左右,其中医学、农学类典籍因应用广泛,无论留存还是整理数量都最多,其他科技典籍整理十分有限。应该强调的是这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影印,点校整理的并不多,比如农学类典籍,也就百余种²。对于科技史研究来说,基础文献的整理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二、整理成果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³。但是此计划只包括文史哲典籍,不包括科技典籍。然而,当时恰逢“向科学进军”运动,整理祖国科技遗产,为社会服务成为时代的旋律,中医和农学古籍的整理也就很快被提上日程。

1954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出版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整理、编辑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医书……”遵照指示,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影印或重印了一大批的中医古籍,也出版了一些中医古籍的点校本,如《本草纲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卫生部为落实国家《1963—1972 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中“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的任务,决定对《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大成》7 种古籍进行校释,但由于“文革”被迫中断,直到 1979—1984 年才陆续完成出版⁴。1955 年 4 月,农业部召开了“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根据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统一计划,农业出版社制订出包括 200 余种典籍的《中国古农书丛刊选题计划(草案)》,至改革开放前出版了约 50 种,有石声汉与万国鼎分别辑佚的《汜胜之书今释》《汜胜之书辑释》,胡道静辑录的《种艺必用》《四民月令校注》《陈旉农书校注》等⁵。这一时期整理的科技典籍还有钱宝琮《算经十书》、

¹ 李娜华、曾主陶《书林之盛,图苑之幸——评〈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 年第 5 期,84 页。

² 肖克之、李兆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概况》,载《古今农业》1990 年第 1 期,167—172 页;黄建年《新中国农业古籍整理出版简目》,载《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³ 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中华书局,2003 年,3 页。

⁴ 张效霞《中国中医古籍整理的历史、成绩与经验》,载《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 年,244—276 页。

⁵ 朱洪涛《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 年,134—137 页;肖克之、李兆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概况》,载《古今农业》1990 年第 1 期,

高亨《墨经校诂》、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中华书局编辑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等。

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并做出了“古代医、农、科技以及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将分别请由卫生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另行制订规划”的决定。因此，卫生部单独制定了《1982-1990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拟整理出版中医古籍686种（整理出版592种，影印出版94种）。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11种重点医书的校注本和语译本系列，也点校、整理了大批医书，如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善本孤本医书《中医珍本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医学珍本丛书》及《珍本医书集成》、中国书店的《中医基础丛书》、上海书店的《中医古籍善本丛刊》、上海三联书店的《历代中医珍本集成》等，都是质量不错的影印本¹。农业方面也制订了《农业古籍整理九年规划（草案）》，重要的有：《中国农书丛刊》，接续和继承了之前的《中国古农书丛刊》，迄今已出版了近40种，如王毓瑚整理的《王祯农书》、石声汉整理的《农政全书校注》、缪启愉整理的《齐民要术校释》《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对孤本、善本的影印，后来仅出版了3种²。

1992年5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全面规划文史哲古籍整理的同时，亦将科技古籍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文、史、哲、科技古籍全方位统筹的局面³。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仍然是一枝独秀，以丛书突显规模效应，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古籍整理丛书》自80年代初至今约有300余种，还有中医古籍出版社的《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等等。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收录散佚海外的珍稀中医古籍427种，非常难得。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80年代，巴蜀

167—172页。

¹ 张效霞《中国中医古籍整理的历史、成绩与经验》，载《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244—276页。

² 朱洪涛《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年，134—137页。

³ 呼素华《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与展望》，载《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年，102页。

书社策划出版的《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即包括不少科技典籍，如吴应寿《徐霞客游记导读》、闻人军《考工记导读》等。9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上百位专家遴选并整理中国古代科技基本文献，编成共约四千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该书共影印科技基本典籍 541 种，编者为每种古文献都撰写了提要，受到国内外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欢迎。科技典籍的出版在医学和农业外也呈现系列化的趋势，如李迪主编《中华传统数学文献精选导读丛书》出版了 6 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至今仍在出版，有近 20 种。黄兴涛、王国荣主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与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已出版前两辑)收录了 30 余种汉译西方科技著作，如《几何原本》《坤輿格致》《视学》《自鸣钟表图说》等。张柏春、孙显斌主编《中国科技典籍选刊》前两辑也已出版。近期还出现了一些文献汇编的整理，如王世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冯立昇主编《畴人传合编校注》、陈雷主编《中国水利史典》等。其他重要的整理成果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郭书春《九章算术汇校》、李继闵《九章算术校证》、潘鼐重辑《崇祯历书》、朱维铮与李天纲主编《徐光启全集》等。

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目录和提要的编撰就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数学、医学和农业三个领域。20 世纪以来裘冲曼、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都做过中算书目编撰的工作，李俨的工作最有代表性，包括《中算书录》《明代算学书志》《近代中算著述记》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其藏书编纂的《李俨收藏中算书目录》等，李迪在各家书目的基础上主持编纂《中国算学书目汇编》¹。医学典籍方面的目录代表性的有冈西为人（Okani Tameto）《宋以前医籍考》、丹波元胤（Taki Mototsugu）《医籍考》、余瀛鳌和傅景华主编《中医古籍珍本提要》、裘沛然主编《中国医籍大辞典》等提要目录，以及郭霭春主编《中国分省医籍考》、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主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与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的薛清录主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综合目录。农业典籍方面的目录代表性的有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天野元之助（Amano Motonosuke）《中国古农书考》等提要目录，以及先后编纂成的北京图书馆主编《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中国农业历史学会

¹ 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副卷第二卷·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4页。

和农业博物馆主编《农业古籍联合目录》、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等综合目录。

另外，海外也有一些中国科技典籍的整理成果，如葛瑞汉对《墨经》的研究和译注¹。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史共同研究班，前后延续数十年，成为当时国际上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中心之一，研究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会读”，例如在藪内清（Yabuchi Kiyoshi）主持期间先后花费了20年的时间，集体研读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物理小识》等典籍²，除结集相关论著外，还出版了藪内清译注的《天工开物》、梅原郁（Umehara Kaoru）译注的《梦溪笔谈》等。此外，在中国、德国和美国先后举办了六次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渐渐地中国科技典籍研究已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方向。

三、问题与思考

这些整理工作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利用的科技典籍文本和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和整理目标等方面的限制，不少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缺憾。

首先，一些整理工作使用底本和校勘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章培恒在《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范化问题——以底本问题为中心》中指出至少有底本选择不善，点校失误；所用底本说明不清；不忠实地以其交代的底本为底本；改动底本文字不说明等几方面的问题³。影印本就常常存在所用底本说明不清的问题，如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针灸大成》，整理说明称是“明刊本”，实际上是用清重修本、递修本拼合而成。1961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针灸聚英》排印本称以日本翻刻本为底本，参校嘉靖初刻本，实际上与两种版本都不同，除字句外，篇名、按语都进行了改写而未做任何说明，后来点校明以后的针灸典籍，又均用此排印本做参校本，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⁴。

再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囊括了章文指出的种种问题。《王祯农书》在20世

¹ 葛瑞汉《晚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香港中文大学，1978年（A.C. 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The Hong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² 川原秀城（Kawahara Hideki）《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科学史研究の动向》，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7号，东京大学中国学会，1992年。

³ 章培恒《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范化问题——以底本问题为中心》，载《中国典籍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0—59页。

⁴ 黄龙祥《建国以来古医籍整理若干问题的初步考察》，载《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年，380—388页。

纪 80 年代就出版过王毓瑚的整理本，王氏利用了嘉靖本和四库本两个版本系统，并且给出了大致不错的版本源流情况，应该说是同类整理成果中的上乘之作，这个整理本出版以后，影响很大，比如缪启愉译注本即以此本文字为据¹。我们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发现王氏的整理本限于当时条件，问题还是不少²。比如，按王氏所说文字以四库本作底本，插图以嘉靖本作底本。很遗憾王氏没有指出他用的四库本具体是哪个本子，在王氏整理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还没有出版，文溯阁本恐怕也难看到，他最可能见到的就是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但是经过我们将文渊阁、文津阁两个四库本与王本比对，发现其与两个四库本都有大量文字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与武英殿聚珍本系统（四库本系统的子系统）相合，这说明王氏起初的工作底本不是某个四库本，而是某个聚珍本系统的本子。王氏后期虽然用文津阁本做了对勘，但做得很不彻底。王本甚至还有一些异文不同于所有四库本系统，而与嘉靖本系统相同的情况。另外，王氏所用嘉靖本最初的工作底本恐怕也是后来翻刻的某一版本，而非祖本。我们经过重新校勘，发现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嘉靖本都优于四库本系统，与王氏的结论不同，嘉靖本的缺点在于有不少明显的讹误，所以初判之下，容易得出“舛讹漏落，疑误宏多”的结论，但是这些讹误多为形近音近而讹，校正并不困难。相比之下，四库本系统经过严格的校改，这种低级失误很少。但是嘉靖本的异文相比之下往往更优，四库本系统则多有妄改。如《谷谱·粟》“早田净而易治，晚者芜蕨难出”，“出”四库本作“治”，与通行本《齐民要术》同，此段虽是《齐民要术》文字，却是从《农桑辑要·种谷》转引，嘉靖本与元刻《农桑辑要》同为“出”，并且《齐民要术》金泽抄本亦作“出”³。实际上“芜蕨”用“出”字表示除去之意更为妥帖，“治”古义是治理的意思，反而不搭配，且有上下重文之嫌。又如《谷谱·大小麦》“惟快日用碌碡碾过”，缪启愉注：“‘快’，各本作‘伏’，后人所改。按本段出于《要术·大小麦》篇，《要术》的两宋本及元刻本《辑要卷二·大小麦》所引《要术》都作“快”，而辑自《永乐大典》的殿本《辑要》作“映”；但查《永乐大典》卷 22181 ‘麦’字下引录王祯《谷谱》也是‘快’，而‘伏’‘映’为后人误改。今按：‘快’是‘好’的口语”⁴。缪氏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受王毓

¹ 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² 参考孙显斌、攸兴超点校《王祯农书》“导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年。

³ 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 年，59 页。

⁴ 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511—512 页。

瑚整理本误导，实际上嘉靖本和《永乐大典》引文此处正作‘快’，可能又是四库本系统不解“快日”而误改。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遍阅各版本，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校勘和分析，根据学者的研究，不仅不同的版本之间差异需要重视，甚至不同印次之间有时都有不少重要的差异，而这些信息往往提示了研究该文献的重要线索¹。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机构越来越开放，更多的古籍图像得以数字化上网共享，所以在今天的条件下，即使以前整理过的典籍，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和检视。

其次，无论是古籍影印还是排印点校的整理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但同时它们又是互补的。众所周知，影印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典籍的原貌，但是既不方便阅读，也不方便展示点校成果。而做过点校整理的同仁都有体会，百密一疏，再仔细认真也难免出现漏校等问题，以致形成对读者的误导。另外，古籍的书叶里蕴含了更多的信息，这些往往会在排印本中遗失，应该说影印图像和文本点校排印两种整理方式对研究者来说都很重要。这样就有专家指出要想真正达到既整理典籍，又保护典籍原貌的双重目的，必须在整理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现有的条件下，采用影印—排印对照的点校、批注整理方式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不同水平的整理者可相应地选用不同难度的操作方式²。张柏春、田淼、雷恩（Jürgen Renn）、马深孟（Matthias Schemmel）等国际同行合作整理的《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就采取图文对照的版式，将书影与录文、校释文字对照排版，这样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典籍原貌，同时又提供了点校整理成果，方便研究和阅读，将这一理念最先在中国付诸实践。按照这种新的整理方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策划了《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以图文对照的方式整理中国科技典籍，提供高质量、可靠的文献整理成果，为学术研究和利用提供方便³。

最后，我们在整理实践中发现被学界遵从的“定本式整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涉及到校勘的目的问题。一般我们都认为校勘的目的是回到“作者”，倪其心指出“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务是力求存真复原，努力恢复古籍的原来面貌，

¹ 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

² 黄龙祥《建国以来古医籍整理若干问题的初步考察》，载《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年，388页。

³ 张柏春、孙显斌《中国科技典籍选刊》总序，载《王祯农书》，湖南科技出版社，2014年，1—3页。

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¹这种旨趣正与鲍尔斯(Fredson Bowers)、坦瑟勒(Thomas Tanselle)提出和推动的“作者意图理论”(authorial intentions rationale)相呼应²。这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必然取向,我们希望还原作者的原稿形态,才有可能最忠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研究该文献。问题还不是我们能否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只能也必须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的面貌,真正的问题是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尽管它很基础很重要。绝大多数的文本在流传中都会发生各种变异,这也是我们需要校勘的原因,但是每一种变异的文本都可能有它独立的影响,即有它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有它的传播史和研究史。无论是源自法国的“文本发生学”(genetic criticism)还是麦根(Jerome McGann)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最终文本,而是以实证的方式,重建文本形成过程的事件链条³。而回到“作者”的文本消除了传播中的文本变异,仅仅依靠它对文本的流传和影响将一无所知,有时候反而会被误导而感到困惑。还是举《王祜农书》的例子,它问世后多有流传,影响广泛,通过考察包括《农政全书》在内的十数种典籍的引用,发现全都依据嘉靖本系统,四库本系统诞生后几乎毫无影响。例如《农器图谱·田制门》“区田”:“又参考《汜胜之书》及《务本书》”为《农政全书》所引,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校记称王祜引文作“务本新书”;“诸山陵、倾阪及田丘城上”,石校称王祜引文“丘城”上无“田”字⁴。实际上石声汉依据的是王毓瑚整理的四库本系统,嘉靖本系统与《农政全书》引文全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⁵。根据《农政全书》引《王祜农书》的异文特征,可以推断徐光启依据的正是嘉靖本系统。我们暂不论嘉靖本和四库本系统文本的优劣,只讲嘉靖本在历史上的影响,不清楚其面貌,就会像石氏那样因为仅依据四库本系统,得出王祜原书不作此的错误结论。而这正是因为四库本系统民国万有文库本和王毓瑚整理本的出版流行,反使此前流行的嘉靖本淹没无闻了。

通过版本源流的分析,选择最善本作为底本进行汇校的“定本式整理”,对于回到“作者”的目的来说自然是最有效最省力的方式,版本源流提纲挈领,校勘记撰写要言不烦。但是它的局限就在于无法全面展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情

¹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6页。

² 参考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编译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VIII—IX页。

³ 参考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编译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IX—X页。

⁴ 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6页。

⁵ 参考孙显斌、攸兴超点校《王祜农书》“导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况，大量丢失考察文本传播史和研究史的重要线索。因为在“定本式整理”的范式下，对于错误或者意义不大的异文是不需要在校勘记中都繁琐地罗列的，它们无助于还原文本原始面貌。但如果从发生学方面考察，即使不是一个善本，特别是通行本，考察和记录它的异文情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些异文特征可以提示我们在传播中的文本形态，帮助我们揭示各种文本形态的传播与影响。早有学者指出“定本式整理”的这一问题，如乔秀岩（Hashimoto Hidemi）就指出乾嘉以前与道咸以后，流行的版本有较大差别，道理很简单，乾嘉时期出现的大批古籍整理成果，遂成为后来主要流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自然不是乾嘉学者平常使用的。至于道咸以后学者使用过的书与版本，时间越晚越接近我们现在的藏书。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聵”字下引《淮南·坠形训》“夸父聵耳在其北”，高诱注“聵耳，耳垂在肩上。聵读衣褶之褶。或作掇，以两手掇其肩之耳也。”高注末句费解，现通行本作“以两手掇耳，居海中”，不言有以上异文，后查张双棣《淮南子校释》才知“王溥本、朱注本”作此，说明段玉裁自有所本，所以校书必须注意作者用过的书和版本¹。“定本式整理”无法解决这一需求。

当然，有了提纲挈领的版本源流情况，我们一样可以将异文罗列做得高效省力，不需要大量重复地罗列各本的异文，只需要罗列各版本子系统祖本的特征异文就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每种版本在其子系统中例外的异文才须罗列，但是数量不会太多，并且这部分异文罗列不用放在图文对照的页面，可以附在每卷之后或者全书之后，以供查考。

四、结论

现今通行的古籍整理方式的理念和实践肇始于百年之前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更是不断制定规划，总结和完善理论，铺开实践，产出了大量包括科技典籍在内的整理成果，但仍有数量巨大的典籍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理论和实践也需要不断提炼和总结。对于已经整理过的典籍，在今天这样一个学术条件更开放更优越的时代，也需要重新评估和检视。根据整理古籍的实际经验，我们提出一种典籍整理的新范式，称之为“图（像）定（本）异（文）参照式整理”。这一新范式反映了我们在典籍整理中希望贯彻的“三心二意”：三处用心，即影印最大限度保持典籍原貌的图像，配以对应的标点文本和校勘成果，

¹ 乔秀岩《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载《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26—27页。

最后辅以各版本的特征异文；两个用意，即回到“作者”的文本还原和文本传播的发生学网络。也只有这样才足以支撑我们对典籍全面的历史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